

邓小平哲学思想 新论

左开大 林瑞英 主编

群众出版社

西南政法大学重点课题

邓小平

哲学思想新论

主 编 左开大 林瑞英
副主编 曾凡跃 杨晓平

群众出版社
2003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哲学思想新论/左开大,林瑞英主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 6

ISBN 7-5014-2944-8

I. 邓… II. ①左…②林… III. 邓小平理论—哲学
思想—研究 IV. A849.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845 号

邓小平哲学思想新论

主编 左开大 林瑞英

责任编辑: 常玉兰

封面设计: 王 子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09 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944-8/A·4

定 价: 14.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前 言

在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她以巨大的革命勇气和理论魄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之魂,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厚土壤,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新境界,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不愧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迈向新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保证的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我们所撰写的《邓小平哲学思想新论》主要是对邓小平理论丰富而精辟的哲学思想作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阐述,促进和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并以此表达我们对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编者

2003 年 2 月 15 日

目 录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	(1)
邓小平的实践观·····	(10)
邓小平的改革观·····	(27)
邓小平的发展观·····	(64)
邓小平的社会历史观·····	(112)
邓小平的主体观·····	(130)
邓小平的价值观·····	(155)
邓小平的人文观·····	(186)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	(218)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已经度过了一个半世纪，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始终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着、发展着、完备着的科学体系。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或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它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是供研究使用的科学方法。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因而能够永葆其革命青春。以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几代志士仁人经过艰苦奋斗，努力探索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历史和实践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最突出的理论特点是中国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100年，可以用得上一句中国民间古老的祝福——百年好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认识到“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中国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中国。科学社会主义需要中国的实践来认识，需要中国的实践来证明，需要中国的实践来丰富，需要中国的实践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中

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在深刻反思、认真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和研究别国的实践经验与当今世界形势的基础上,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成果。这一理论同样在实践的过程中,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和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指这一理论在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牢固地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上,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中。

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自然是这一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理论所致力于解决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在这一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道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关于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其所以强调和突出这一主题,为的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能够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社会主义这个美好的词,社会主义这个优越的制度不致因为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或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而得不到体现,为的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使我们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用客观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并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

在中国的巨变中,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威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①“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①

邓小平理论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把科学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当前已跨入新的世纪,国际局势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动,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伴随知识经济的到来,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当代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我们既面临良好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如此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前,我们靠什么去洞察世界的风云变幻?靠什么去把握世界的大局和全局?靠什么去看准并跟上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只有靠邓小平理论,才给我们提供分析和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思想武器。

总之,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二、邓小平理论,处处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辉

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过程中,有的人认为,邓小平是革命家、政治家,但不是理论家,他的论述中所讲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理论。在有些人的心目中,邓小平没有哲学思想,因为他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那样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这些看法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曾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理论,都深深的植根于社会实践之中,没有革命的实践就没有革命的理论。凡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政治家,大都是兼而为理论家。邓小平同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我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巨大贡献,这难道还不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当然就邓小平的哲学思想而言,他不是某些哲学大师从思辩的角度和知识的形态去推进哲学思想的发展,也不像很多哲学工作者就哲学的某些命题、范畴开展学术性讨论所做的贡献。但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来讲,就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共产党人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影响来讲,邓小平哲学思想无可争议地处在超群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在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的方法、道路问题的探讨和激烈争论中进行的,它不是少数学者埋头书斋的玄思冥想,而是直接与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直接推动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开展。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又反过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中国化并成为更多追求真理的人们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理论飞跃的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邓小平理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一个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

邓小平哲学思想主要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的哲学概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包括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哲学总结、对历史教训和现实缺点的哲学批判,还包括对毛泽东晚年指导思想上主观主义失误的哲学反思和哲学纠正。正是在这些哲学概括、总结、反思、纠正和批判中,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体系。其主要哲学观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实事求是观点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并构建科学体系的基石。他把实事求是观点同物质第一的观点和实践第一的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在邓小平的论述中,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前提,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途径,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把这三者联系起来,明确地形成对实事求是哲学命题的整体认识,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特别是邓小平对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正确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不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第一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①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他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作为实事求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把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各项工作的得失成败的标准。另外,理论上还深刻分析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新的角度拓展了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并认为,实事求是是用中国语言、简明扼要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是当代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

(二)矛盾观点

邓小平同志精通辩证法、熟练运用辩证法,是“按辩证法办事”的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代大师。他在任何时候,研究任何问题,都善于从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和过程,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避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诸如:“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先富、后富、共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等无不贯穿着辩证法的全面性。毛泽东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邓小平根据这个“精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命题,充分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仅如此,他还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一个主要矛盾”因而在党的基本理论中提出了“一个中心”、“一心一意、抓住不放”的重要方法。他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全面地分析周围形势,冷静地处理各种矛盾,坚定地把握工作大局,踏实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又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围绕着总的工作中心而开展的任何工作中,都不能三心二意,都不能有所松懈。邓小平就讲过:“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② 他还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③

(三)生产力观点

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④ 因而把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理论,并把它置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首,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提高和不断满足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主线,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线。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无不围绕着生产力这条主线,无不建立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特别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和新经验的新概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这对于研究和分析当代实际问题和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 人民群众观点

邓小平同志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作为封底题词的那段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恰当地反映了邓小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和深厚感情。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价值观。他一直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对人民负责”、“为人民造福”、“取信于民”的价值观。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主体、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价值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 20 世纪有两大理论贡献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话,那么这两大理论的基础部分是两大哲学思想,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它所展现的正是现代和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的精华,揭示的正是不断充分享受文明的中





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活的灵魂。它们无论是对中国的现实或将来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一个伟大的事业,不可能没有理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没有理论的思维;一场伟大的实践,不可能不产生属于自己的崭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旗帜,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过去一百年的一个历史性的总结,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跨入新世纪的一次历史性的展望。



邓小平的实践观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

邓小平是成长于实践并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成熟的思想家;邓小平理论诞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理论。鲜明地突出和坚持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把实践标准和实践过程具体化,把科学的实践观创造性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基本常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是邓小平理论大众化、实用性的根源,是邓小平理论的突出特征之一。

一、邓小平实践观形成的基础

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和坚持实践的理论地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转化为亿万群众的基本常识,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是邓小平实践观形成的基础。

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它是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孕育、产生和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生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生命活力和革命的批判精神的根本之所在。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左”的错误思潮逐渐滋长蔓延,加之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大搞现代迷信,大肆宣扬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把毛泽东科学思想体系阉割为“语录”的汇集,作为人们一切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标准,要人们在其中去寻找一切问题解决的“答案”,把充满生命活力和革命批判



精神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僵死教条,完全排斥和抛弃了实践在理论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党的思想路线。

1976年10月,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入了一个转折的关头。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裕,社会要进步。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对过去发生了疑问,迫切希望改变过去错误的做法,使中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改变的有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就是撤销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决定。然而,当时以华国锋为主席的党中央领导却在1977年2月7日发表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即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他们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政治思想上要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路线;在哲学思想上,仍然坚持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表明人们的思想仍然被严重地禁锢在过去错误的、僵化的、左的思维方式中。显然,这种情况不改变,“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就不能纠正,社会就不能前进,国家就没有前途和希望。

为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在1977年5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行”。^①“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唯物主义的问题。”^①

1977年7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述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时说,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1977年9月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②同时指出“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③号召人们要“解放思想”。^④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思想、理论、行为的是非标准问题的思考。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这篇文章,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甚至认为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是“砍旗”,要进行追究、处理。邓小平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坚决的支持,他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⑤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⑥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热潮,到1981年,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已经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广大群众的基本常识。正如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页。

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109页。